

军眼观察

暴力对抗频现 巴以冲突难息

■舒梦 杨光

军眼聚焦

8月5日,以色列战机向加沙地带发动空袭,击中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多处目标,杰哈德随后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以示报复。8月7日,双方在埃及的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这是巴以自2021年5月以来爆发的最大规模军事冲突,已造成40余人死亡,300余人受伤。

冲突暗含多种考量

此次冲突是巴以长期间歇性低烈度冲突的又一次爆发。在以色列2005年撤出加沙地带后,以方与加沙不同的武装派别爆发过4次大规模冲突及多次小规模摩擦。近年来,中等规模的冲突略显频繁,例如在2019年、2021年、2022年,双方均爆发了中等规模冲突。与此前相比,本轮冲突有几点不同。

其一,冲突主要对象发生变化。以往,以色列的冲突对象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为主,而2019年与2022年的冲突对象都是杰哈德。该组织是加沙地带除哈马斯以外的第二大军事组织,与伊朗之间的关系密切,被外界视为伊朗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代理人。

其二,以色列采取了先发制人的

行动策略。在以色列与加沙方面的历次大规模冲突中,以色列更多处于明面上的防守反击状态,以为其军事行动增添更多“合法自卫”色彩。然而,以色列此次却先行发起行动。以色列军方认为,杰哈德正准备对以色列平民发动恐怖袭击,因此需要对其进行先发制人打击。此次冲突也是以色列“累积威慑战略”的又一次实践,以色列希望通过“睚眦必报”的军事行动与重复性军事打击,让敌方认识到以色列的实力与决心,最终放弃与以色列敌对的政策。

其三,冲突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这次行动旨在消除对以色列公民以及加沙附近平民的威胁,针对的是恐怖分子及其幕后支持者。但考虑到以色列即将在11月举行大选,以此主动发起有限军事行动,政治作秀的意味更浓。对于以色列现任看守政府总理拉皮德来说,其不支持扩建定居点、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等主张长期得不到右派支持,在大选之前开展这样强硬的军事行动可以拉拢右派,得到较高的政治收益。

停火协议脆弱不堪

巴以在埃及的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符合双方需求。但在停火协议签订后,杰哈德依然零星地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并未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停火。

对以色列来说,其发动袭击的对外威慑和对内团结的目的已基本实现,冲突的进一步升级并不符合自身利益。此次冲突中,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老对头哈马斯并未参与。如果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时间过长,哈马斯很可能会迫于压力加入战局,导致冲突的升级。此外,如果以色列对杰哈德的打击力度过大,导致该组织一蹶不振,反而会打破加沙地带的力量平衡,导致哈马斯在加沙一家独大,或由其他组织填补杰哈德衰弱带来的势力空白,给以色列的国土安全带来新的变数。对杰哈德来说,自身实力有限,无力坚持长时间的火箭弹袭击。

尽管如此,双方的协议只能带来脆弱的停火。以色列与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组织斗争多年,彼此长期存有防备、疑虑和对抗心理,这在短期内很难改变,双方还存在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一方面,在以色列国内三次五次大选的情况下,各个政党及其领导人均倾向于在安全问题上打强硬牌,通过有限的军事行动来展示自身保卫以色列安全的决心与实力,以此在大选中获取更多支持。另一方面,加沙地带内部矛盾复杂,增加了该地区的不确定性。新冠疫情暴发后,加沙地带的经济和财政危机加剧,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经济限制也更加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加沙地带的经济形势随时处于崩溃的边缘,当地武装派别很可能通过对以发动袭击来转移矛盾。

诸多矛盾难以化解

除巴以各自的内部矛盾外,双方间的结构性矛盾也使和平在短期内难以真正实现,新一轮冲突的结束也仅仅是下一场冲突开始的铺垫。

巴以双方长期存在的核心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在边界问题上,自1948年以来,以色列方面的实际控制领土范围不断扩张;在定居点问题上,位于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已形成规模,不断割裂巴勒斯坦人聚居区,巴勒斯坦人生存空间进一步减少;在难民问题上,随着中东热点问题的不断涌现,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难民的关注度逐渐降低,巴勒斯坦难民长期陷于归国无望、融入困难的两难境地。

巴以新问题不断涌现,增加了局势的复杂性。其一,在巴勒斯坦内部出现了地理割据和政治决裂的局面,分化了巴勒斯坦方面的实力。其二,疫情让巴以和谈的前景更加黯淡。受疫情影响,巴勒斯坦经济损失严重,治理能力缺乏问题凸显,内部稳定面临挑战。疫情导致的巴以实力差距扩大化,将会进一步减少巴勒斯坦方面的政治外交斗争空间。当实力差距过大时,部分巴勒斯坦极端主义者可能会诉诸于极端手段对抗,给本就脆弱的地区安全环境带来冲击。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



8月6日,加沙地带南部城镇拉法遭空袭后升起浓烟。新华社发

美对以军援加剧地区动荡

着眼维持「特殊关系」,军援金额不断攀升

■王毅 李瑞景

据报道,以色列前副国家安全顾问查克·弗雷里奇近日表示,到2029年新的10年军事援助计划结束时,美国对以援助将进一步增加到1650亿美元。军援一直是美国插手中东事务的特殊方式,而对以色列军援则是重中之重。

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早已有的。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起,美国就开始对其进行援助,但主要以经济援助为主。当时,美以关系远未像今天这样热络。美国为确保其中东利益“两面下注”,同时还向以色列的对手阿拉伯国家提供大量援助,其中便包括军事援助。转折点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由于与苏联在中东地区的全面博弈中逐渐处于下风,美国开始考虑重点扶植以色列,将其作为自己在中东地区的“桥头堡”和“代理人”。

在此背景下,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于1961年首次提出美以“特殊关系”,并开始向以色列出售大量先进武器装备。1968年,美国向以色列出售F-4“鬼怪”战斗机,标志着美国的中东政策从维持平衡转向确保以色列的相对军事优势。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眼见埃及与叙利亚联军一度占据战场主动,尼克松政府紧急向以色列运送价值8.25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帮助以军最终反败为胜。此战之后,以色列在中东的优势地位进一步确立。

同时,美国与埃及关系的改善以及由此促成的埃以《戴维营协议》的签署,也使美政府逐步转变对以色列军援的思路。正如尼克松所说:“我们要使以色列强大到不怕谈判,但又不能使他们过于强大而认为不需要谈判。”

上世纪80年代开始,里根政府在美苏争霸中采取更加具有进攻性的态势,以求扭转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为此,美将以色列视为其中东地区最重要的战略支点进行经营。1983年,两国签署《美以战略合作协议》,全面加强两军合作关系,将美国对以色列的军援制度化。冷战结束前十年,美国共向以色列提供35.5亿美元军事贷款和147.649亿美元军事赠款,而以色列则报之以军事情报等支持,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

冷战后,以色列不仅承担起美国在中东推行“民主化”的前哨任务,还协助美国打击中东地区的反美势力以及恐怖主义势力。与此同时,美国对以色列的军援金额也不断攀升。1999年,美以两国签署每年高达2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协议,2007年这一金额升至30亿美元。2016年9月,美国与以色列又签署一项总额高达38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谅解备忘录,规定自2019至2028财年,美国将每年向以色列提供3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也成为美国历史上数额最大的双边军援计划。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正值两国关系因奥巴马强势推进伊核协议而出现严重裂痕之时。可见,军事援助已成为美以特殊关系的重要“压舱石”。

军援在很大程度上造就并持续维系着美以之间的“特殊关系”。一方面,美国不断加大对以色列的军援力度,强

大的犹太院外游说集团等因素且不说,在从中东撤军实现“战略收缩”以全力实施“印太战略”的大背景下,维系其中东的利益也需要以色列这颗“棋子”。另一方面,以色列对美国军援有深度依赖,将其视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据统计,自1951年至2020年,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达到近1100亿美元。近年来,以色列每年的军费预算在200亿美元左右,而从美国获得的军援就将近40亿美元。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对以色列的军援时常加剧地区动荡和冲突。如2021年5月,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爆发严重流血冲突,在各方积极劝和促谈之时,美国拜登政府居然批准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达7.35亿美元的精确制导武器。这明显是“火上浇油”,对巴以冲突缓和与中东地区和平稳定造成严重破坏。

莫桑比克海峡——石油海运的黄金水道

■茅蔚业 周嘉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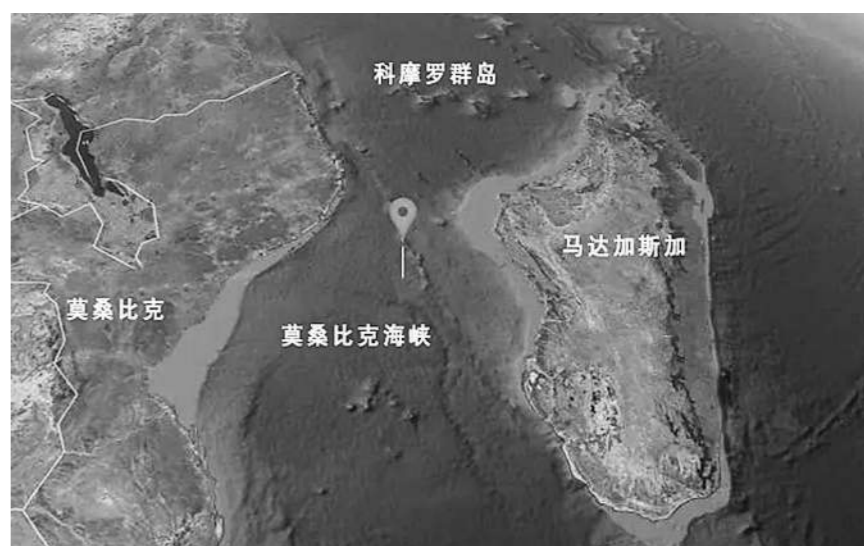
兵史地志

莫桑比克海峡位于非洲大陆和马达加斯加岛之间,东滨马达加斯加,西临莫桑比克、贝拉、克利马内等。该地区也由此成为殖民者向东非和亚洲扩张的基地。直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海峡三国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科摩罗先后宣告独立,该地区才摆脱殖民统治。

近年来,由于苏伊士运河通航能力的限制,再加上“过路费”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巨型油轮选择通过莫桑比克海峡前往大西洋。此外,莫桑比克海峡秀美的风光和便利的海上交通,也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和船舶,为海峡地区国家的旅游业和港口业带来相当可观的收入。

除经济价值外,莫桑比克海峡的军事价值也在不断上升。在海峡两岸,莫桑比克与马达加斯加都建有海军基地,停泊军舰。去年3月,“长赐”号货轮搁浅造成苏伊士运河堵塞,导致原计划途经该航道部署到中东的美国海军“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在地中海滞留多日。虽然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在任何情况下,美军都有各种各样的替代方案来实现任务成功,满足任务要求”,但今后如果发生类似的情况,恐怕美军不得不认真考虑军舰绕行好望角的方式了,届时莫桑比克海峡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高。

下图:莫桑比克海峡地理位置示意图。资料图片



恐怖袭击不断,安全形势严峻——

马里和平之路任重道远

■刘诗琪

8月7日,马里东北部一处军营遭恐怖分子袭击,42名士兵死亡,22名士兵受伤,3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马里政府表示,此次袭击很可能由极端组织“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实施。该组织效忠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地处萨赫勒地区的西非国家马里、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活动,不时在马里和尼日尔交界地区袭击军队和平民。

此次袭击是马里10年来安全局势趋于恶化的缩影。2012年,分裂分子控制了马里北部,引发马里危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等恐怖和极端势力借机在马里北方扩充势力,导致北部地区冲突不断。此后,恐怖势力不断分散南扩,马里中部及边境地区频繁发生恐怖袭击等事件,首都巴马科等地区的恐袭风险也愈发高企。马里恐怖主义与暴力活动激增并向周边国家蔓延的态势,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近年来,在联合国马里多层次综合稳定特派团、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维和部队等力量支持下,马里国内形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但是,随着2017年“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遭受重创,大量非籍恐怖分子回流非洲,“圣战主义”思想在马里

北部地区进一步滋长。马里的反叛武装与激进势力相互勾结,使这一地区日益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恐怖主义与暴力活动不断向布基纳法索北部和尼日尔西部边境地区扩散。在袭击手段上,恐怖分子各自为战、机动出击,制造自杀式恐怖袭击,不但造成严重人员伤亡,还对社会秩序造成巨大冲击。目前,包括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等国在内的非洲萨赫勒地区是非洲恐怖主义活动最猖獗的地区。

马里安全形势持续恶化,恐怖袭击风险呈上升趋势,折射出该国面临的多重危机。

政治上,马里政坛动荡不安。2020年以来的两次政变,使本就脆弱的社会安全形势蒙上阴影。加之过渡政府的政策缺乏延续性,遏制恐怖活动、极端暴力的难度不断加大。

经济上,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对马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有关国家从2020年起对马里实施多项金融和贸易制裁,使马里的经济困境雪上加霜。根据世界银行报告,2021年马里的经济增长率仅为3.1%,全国贫困率上升到44.4%。此外,由于降雨量创历史新低,马里的粮食产量较五年平均水平减少了15%,目前约有120万

人处于粮食严重短缺状态,需要紧急粮食援助。民众的生存难以得到保障,也缺乏发展机会。

国际支持下,今年2月,已在萨赫勒地区进行了9年反恐行动的法国宣布从马里撤军。以法国为首的多个国家撤军,客观上给马里带来一定的安全真空,恐怖势力或借此机会增加活动频率。

面对马里当前安全局势的复杂性,须从治本出发,发挥萨赫勒五国集团作用,加大国际支持,避免“越反越恐”。一是要以发展促和平,提高马里的经济水平和治理能力。马里需在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保障就业和教育等方面加大投入,把资源和力量投入到国家发展之所需,注重解决根源性问题。二是要发挥萨赫勒五国集团作为反恐前线的作用。萨赫勒地区国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马里、布基纳法索、乍得、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五国应共同筑起一道打击恐怖势力的屏障。三是国际社会应加大对马里等萨赫勒国家的支持,进一步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尽可能消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